

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的刑事司法協助研究 ——以澳門特區打擊跨境洗錢犯罪為視角

盧頌馨*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摘要：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澳門、香港與廣東省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澳門也亟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由於澳門特殊的產業結構和地理位置導致跨境洗錢犯罪非常氾濫，因此刑事司法協助也被提上了日程。本文將從澳門與其鄰近地區針對洗錢犯罪的立法沿革和司法現狀出發，在探索刑事司法協助困境的過程中分析爭議問題所涉及的原則問題，同時從既有立法、法律依據和實踐基礎三個維度論證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刑事司法協助的可行性。最後，在堅持主權唯一原則和相互尊重原則的前提下，通過拓展個案協查制度、增強區際警務合作交流機制、促進各地間刑事司法協助協議簽訂的三種具體路徑，從而尋求「一國兩制」下粵港澳大灣區刑事司法協助的新模式。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刑事司法協助；跨境洗錢犯罪

Research on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in the contex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A case study of combating cross-border money laundering in Macao

Songxin LU*

(Shenzhen Polytechnic)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Outline Development Plan for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ao,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Province is becoming closer and closer, and Macao SAR should integrate in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Due to the speci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crime of cross-border money laundering in Macao SAR is very widespread, so the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has also been put on the agenda. The article will start from the legislative evolution and judicial status of money laundering in Macao and its neighboring areas, analyze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in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dilemma of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and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in the context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constitutional basis, existing legislative, legal basis and practical basis. Finally,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and mutual respect, through expanding the case investig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inter regional polic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mechanism, and promoting the signing of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agreement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we can seek to form a new mode of

資助項目：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科研青年創新項目「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法治創新建設的進路研究」（項目編號：6021310010S）；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健全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制度研究」（項目編號：20CFX013）。

* 通訊作者：盧頌馨，哲學博士（法學），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專任教師，深圳大學監察研究院兼職研究員，遼寧科技大學碩士生導師，澳門刑事法研究會會員，主要研究方向：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制度、澳門法律制度、刑法學。E-mail：lusongxin@szpt.edu.cn，Tel:13652586330。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unde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acao SA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cross-border money laundering

0 引言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落成，兩岸三地的經濟、文化和社會交流將會日益加強、關係日益密切，同時「一帶一路」倡議和《十三五規劃綱要》要求澳門建成「一中心，一平臺」，且博彩業發達，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一直實行自由和寬鬆的金融監管制度，以及中國內地的經濟騰飛、經濟交易來往的日益頻繁，與機遇相伴的還有表現為跨境性的洗錢犯罪。近年來，澳門的眾多洗錢犯罪案件的涉案人員或者資金流動等均是具有跨境性的因素。因此，打擊跨境洗錢迫在眉睫，加強區際刑事司法協助也日益被提上議程。

1 立法與司法現狀

根據提供協助主體之間的關係不同，刑事司法協助可劃分為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和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前者指的是一國與另一國之間或者一國與他國某地區之間在刑事司法領域相互提供合作，後者則是指一國內部不同地區之間在刑事司法領域相互提供合作。^[1] 本文主要探討的是後者，即中國四個地區之間的刑事方面的互相協助，主要包括情報交換、調查取證、逃犯移交等內容。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目前中國的法律體系呈現出「一國兩制三法域」的樣態。從法系來劃分，儘管中國內地的法律制度源於大陸法系，然而由於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緣故，因此與傳統的大陸法系有所區別，故一般稱其為「社會主義法系」；香港特區實行的是英美法系，其代表性特徵是遵循先例原則；澳門特區則實行大陸法系，受葡萄牙的影響很深。由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法律制度差異，尤其是在管轄限制、公共秩序保留原則等方面，為跨境的洗錢犯罪提供了便利。

目前，內地與港澳地區的刑事司法協助舉步維艱，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 博彩業在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合法範圍存在重大差異：1、如前所述，中國內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303 條規定了賭博罪和開設賭場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也頒佈了一系列關於辦理賭博相關案件的意見和解釋，如 2005 年《關於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第 9 條^[2] 規定中使用了「少量」一詞，對此該如何界定？2、又比如 2014 年 3 月 26 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關於辦理利用賭博機開設賭場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等司法解釋規定了賭博犯罪具體的刑事立案追訴標準。近至香港特區，遠至美國和加拿大，博彩的合法性範圍的認定是各異的。香港特區承認澳門博彩的合法性，美國的部分州如內華達州和加拿大的部分地區如多倫多均承認博彩的合法性，但是中國內地則認為博彩跟賭博一致，違反了公共秩序保留原則，故拒絕一切與此博彩相關的刑事司法協助。

(2) 洗錢犯罪的偵查檢控難度較大，其行為的隱秘性強，是一種智能犯罪，在偵查過程中收集證據非常困難，也難以達到法定的證明標準。例如：1、中國內地的法條中使用了「明知」一詞，在 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頒佈的《關於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第一條^[3] 中採用推定的六種方式判斷是否為「明知」。這是一種相對推定，但有證據證明的除外，從而保障被告的機會。2、關於上游犯罪未經刑事判決確定的洗錢犯罪案件，根據中國內地 2009 年的司法解釋，應當以上遊犯罪事實成立為認定前提，上游犯罪尚未定罪，需要證據支撐。這與澳門特區的規定不同。而澳門特區第 3/2017 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的第三條（清洗黑錢）

第六款明確提到「無須先對產生利益的犯罪的正犯判刑，方證實和證明所獲得的利益的不法來源」，強調清洗黑錢這類不法行為與上游犯罪各自獨立。換言之，兩地的偵查難度也不相同。

(3) 刑事管轄權競合的處理規則尚屬空白。

《澳門刑法典》第四條的規定了屬地管轄權，而第3/2017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3條的第四款規定「又或即使作出該事實的所在地或正犯的身份不詳」，即普遍管轄權。而中國內地的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6條^[4]直截明確規定了普遍管轄權。就中國內地與澳門特區之間，兩者在刑事管轄權競合的處理規則並無明確規定，導致刑事司法協助難以進行。

以上均可以歸因於一點，即缺乏正式的司法協助機制。內地與港澳開展的刑事司法協助仍然是基於200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的《關於辦理涉港澳刑事個案協查工作程序的規定》和雙方於2001年簽署的《內地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關於建立互相通報機制的安排》。前者主要確定了「個案協查」工作機制，後者主要針對雙方居民非正常死亡及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的個案互相通報特別行政區。由於這兩個檔僅僅規定涉港澳的個案刑事司法協助，而非制度性和系統化的規定，且距今已有接近20年的歷史，因此可以說並未取得實質性的進展。針對逃犯移交的問題，唯一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也只有2005年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之間簽訂的《關於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由此可見，隨著內地和港澳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跨境調查取證、追逃追贓等其他方面的司法協助亟需解決。實際上，澳門曾於2015年年底向立法會提交過《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的草案，旨在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與中國其它司法管轄區未來的刑事司法協助安排，務求透過此法案訂定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的一般原則及規定，維護司法協助程序的參與人的權利及保障，規範接收、傳送、提出、組成及決定刑事司法協助請求的內部許可權；並規範常見的刑事司法協助的內部程序，包括：移交逃犯、執行刑事判決、移交被判刑人、移管刑

事訴訟，以及其他的刑事司法合作。然而，後來卻因為條件不成熟，無法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之間尋求到各方均滿意的平衡點，因此特區政府特區政府致函立法會主席要求撤回了法案。客觀而言，內地與香港特區、澳門特區所開展的區際刑事司法互助活動雖然很多，但主要表現為個案協作、警務合作，刑事司法互助的制度性建設並沒有取得重大進展。^[5]針對澳門特區與中國內地的刑事司法合作從澳門回歸之初已經開始，主要包括2000年-2010年由兩地檢察機關磋商的《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刑事司法協助的安排》和2014年至今由中國內地公安部和澳門行政法務司磋商的《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相互移交逃犯安排》的兩份檔，然而目前仍未達成一致意見。針對不容樂觀的現象，澳門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在不同法系、不同司法和法律制度下開展的區域合作，法律衝突是必然面對的挑戰，其中，澳門與內地在刑事司法協助方面的安排更是空白。」^[6]有學者認為，這不利於打擊日益增加的跨境犯罪和維護澳門法制的尊嚴，也有損澳門作為法治之區的形象。在刑事司法協助方面，有必要重點推進區際刑事司法協助。^[7]

而澳門特區與香港特區則在2005年簽署了《關於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據統計，從2005年《安排》開始生效至2015年7月17日十年間，「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共處理127個相關案件，其中47個被判刑人已移交香港服刑，11個被判刑人因不符合移交條件而不獲准移交，放棄移交申請的有11人，未有移交結果前已因假釋或服刑期滿而出獄的有39人」^[8]。為了加強兩地的刑事司法協助，港澳兩地也就此方面多次磋商，儘管兩地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而不涉及主權問題，然而由於兩地分屬兩個不同的法系，法律制度差異較大，因此就文書送達、調查取證、逃犯移交、刑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等刑事領域的司法協助均仍然未啟動。

在此磋商的過程中，各地區的爭議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原則：

(1) 雙重犯罪原則。這是主權國家之間逃犯移交的常用國際慣例之一，也是罪刑法定原則在刑事司法合作領域的體現。該原則指的是：根據請求國和被請求國的法律，當被請求移交的逃犯所實施的行為都構成犯罪時，才可以進行移交。根據澳門特區第 6/2006 號法律《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6 條（雙重處罰）^[9] 規定，此處的「雙重」是指請求方和被請求方，引致提出刑事司法互助請求的違法行為按照雙方法律都應該是可科處刑事處分的行為。同時，澳門與其餘三地關於罪與非罪的規定差異也很大，尤其是在經濟犯罪領域，譬如在稅務相關的方面，在澳門違反稅務領域屬於行政處罰的範疇，而並未在刑法規制領域對此進行規定。然而，有學者認為該原則並不符合中國國情，不應該適用於中國的刑事司法協助，原因在於「事實上，即使在不是『一國兩制』的國家或地區，『雙重犯罪』國際慣例也並非一定適用，比如，英國《1967 年逃犯法》就規定英國與英聯邦成員國之間移交逃犯，不適用『雙重犯罪』國際慣例。^[10]」

(2) 死刑犯不移交原則。此原則是目前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一項原則。目前，中國內地仍然保留死刑，而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則廢除死刑，四地所屬的法域不同。香港特區於 1993 年廢除了死刑，並在《逃犯條例》第 13 條明確規定了死刑犯不移交的原則；《澳門刑法典》第 39 條明確規定了不得設死刑，第 6/2006 號法律《刑事司法互助法》第 7 條明確規定對於所涉及的事實可處以死刑的有關請求須拒絕刑事司法互助請求。實際上，澳門特區廢除死刑距今更是超過了一個世紀^[11]。也正是因為各地區對此問題的差異，港澳地區往往成為嚴重犯罪份子的庇護所，因此在區際刑事司法合作中如何平衡各方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點，如何規定該原則的適用範圍和技術上如何處理，如何制定移交逃犯機制成為一大難題。有澳門的學者認為美國州際司法協助機制對解決中國區際司法協助問題頗有參考價值，由於「美國州際遣返規定在憲法、聯邦法例和各州法例內，

考慮是否引渡時只會著眼於有關程序是否符合法律上的要求。假如無死刑的被請求遣返州，須把被控以一級謀殺罪的逃犯交予另一個設有死刑的請求遣返州時，並不會因該逃犯可能會被判死刑而拒絕遣返。^[12]」有鑒於此，只要遣返程序符合相關法律的規定，可能判處死刑並不應該成為在區際之間移交死刑犯的問題時拒絕移交的理由。

(3) 本地居民不移交原則。該原則體現在澳門第 6/2006 號法律《刑事司法互助法》的第 33 條的第 1 款^[13]。在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中會涉及本國居民不引渡的原則，而在區際刑事司法協助中通常會被稱為「本地居民不移交原則」。換言之，本地居民不移交原則是區別主權國家為要義的。該原則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和不同的時代均有不同的表現：「在英美國家一般不主張本地居民不移交原則，即使在主張有關原則的大陸法系國家，在進入 20 世紀以後，越來越多大陸法系學者支持引渡本國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趨勢更是越發明顯」^[14]。由此可見，該原則也是有逐漸被摒棄的趨勢，在今天針對被請求過不被認為犯罪的行為一般也可以實施司法協助^[15]。早在 1993 年，黃亞英教授就指出關鍵所在，認為「導致這一差異的主要原因在於英美法系的國家大多嚴格奉行屬地管轄原則，而大陸法系國家則將屬地管轄和屬人管轄結合在一起。^[16]」因此，有澳門的學者認為「『本國公民不移交』實際上是大陸法系國家所奉行的一種國際慣例」^[17]，同時「該原則在兩地移交逃犯的機制中也是不能適用的」^[18]。

(4) 公共秩序保留原則。公共秩序保留原則（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是國際私法中的一項基本原則，起源於學者巴托魯斯提出的法則區別說，當時將之稱為令人厭惡的法則。^[19]之所以談及「公共秩序保留原則」，原因在於本文涉及澳門的博彩業，而「博彩」又往往被等同於「賭博」。在除了「博彩合法化」外的地區，法院在審理此類相關的民事案件或對澳門法院的判決進行承認與執行時通常會以此原則作為不予支持的理由，例如中國內地在審理因澳門博彩而衍生的

債務時就認為澳門涉及賭博的債權均不應受到內地法律保護，原因在於「賭博是我國法律明令禁止的行為，嚴重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涉及賭博的債權嚴重影響了家庭、社會利益，法院應以『適用外國法律或國際慣例不得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利益』的規定拒絕適用澳門特區法律，同樣應當判定此類債權無效^[20]」。因此，有澳門的學者認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往往成為一國一地拒絕向他國他地提供協助的最後理由」^[21]。

2 理論依據與實踐基礎

2.1 既有立法之根源

2.1.1 澳門特區

在回歸前，根據司法慣例，洗錢犯罪通常被歸入 1996 年《澳門刑法典》中的第 228 條「物質上之幫助罪」以懲處幫助他人以便其從侵犯財產犯罪所得中得益的行為。在第 6/97/M 號法律《有組織犯罪法》中，第一章（刑法規定）第 1 條（黑社會的定義）第（u）款提及「清洗黑錢」和第 10 條（不法資產或物品的轉換、轉移或掩飾）的規定實際上是澳門的洗錢犯罪的最早的出處。因應澳門法律本地化的發展，為了更好地打擊澳門的洗錢活動，第 2/2006 號法律《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對《有組織犯罪法》中關於洗錢的規定作出更改，2017 年頒布了第 3/2017 號法律以加強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在這部法律中，擴大清洗黑錢犯罪的上游犯罪的名單範圍，以涵蓋《巴勒莫公約》以及 FATF 的國際標準所指的各類犯罪，強調清洗黑錢這類不法行為與上游犯罪各自獨立，以及便於理解確定行為人罪過的準則等內容。

2.1.2 香港特區

為了打擊毒品犯罪，香港特區在 1989 年制定

了第 405 章《販毒（追逃得益）條例》（DTROP）。1994-1995 年期間，香港特區通過了香港法例第 455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OSCO），其中第 25 條（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第 1 款規定：「除第 25A 條另有規定外，如有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財產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產，即屬犯罪」。這是香港刑事立法中對於洗錢犯罪的定義。構成洗錢犯罪的主體在主觀上必須達到明知或者有理由相信的程度，從而故意協助該有組織集團成員清洗黑錢；根據該條例第 2 條規定了客觀方面。2018 年，香港特區還修訂了第 615 章《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此為更為具體的工作指引。

2.1.3 中國內地

1990 年通過的《關於禁毒的決定》第 4 條對為犯罪分子轉移、隱瞞毒品犯罪所得財物的行為，以及掩飾、隱瞞出售毒品獲得財物的非法性質和來源的行為作了明確的規定。後來在 1997 年《刑法》修訂時，立法者首次創設了「洗錢罪」這一罪名，即第 191 條。第 312 條和第 349 條也分別設置了「窩藏、轉移、收購、銷售贓物罪」和「窩藏、轉移、隱瞞毒品、毒贓罪」。2001、2006、2006 和 2009 年，中國內地通過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對洗錢犯罪的構成要件進行了修訂，包括擴大上游犯罪的範圍、增設「資助恐怖活動罪」、犯罪主體增加了單位犯罪等。最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自洗錢入罪、完善行為方式的用語、刪除罪狀中的「明知」術語和取消限額罰金罰等問題進行了重大修訂。需要強調的是，這次關於自洗錢的修訂不僅是為了與國際並軌，還掃除了中國內地和澳門特區之間刑事司法協助中針對上游犯罪和本罪關係認定的障礙。

2.2 法律依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港澳特區實施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大規定。全國人大也頒佈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分別實施於 1997 年和 1999 年在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93 條和第 94 條的規定，澳門與全國其它地區的司法機關可通過協商依法相互提供協助和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並可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和授權下與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這是澳門特區開展國際司法協助和區際司法協助的原則性規定。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 95 條和第 96 條的規定，香港通過協商依法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並可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或授權下與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這是香港特區開展國際司法協助和區際司法協助的原則性規定。由此可見，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符合我國憲法和港澳基本法的精神，即具有其憲制基礎。

同時，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213 條至第 223 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當局與區外當局進行刑事司法協助進行了規定，亦就區外司法當局作出的刑事判決的審查及確認作出規範，其中《刑事訴訟法典》第 217 條明確移交逃犯的程序由特別法規範。同時，澳門於 2002 年和 2006 年分別通過了《司法互助請求的通報程序法》和《刑事司法互助法》，這兩部法律均都在第 1 條規定：澳門特區可依法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刑事司法互助。這些都是配套性的法律法規，也是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的法律基礎。

2.3 實踐基礎

一直以來，中國內地和港澳臺各地區間一直共同致力於打擊跨境犯罪活動活動，在長期的合作過程中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反洗錢的刑事司法協助奠定了實踐基礎，主要體現在警務合作方面。

如上可知，在港澳回歸前，香港廉政公署與內地檢察機關自 1983 年開始接觸^[22]，1988 年為便利粵港兩地案件協查工作，經香港廉政公署提議，並在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支持和授權下，廣東省人民檢察院與香港廉政公署設立「個案協查機制」，安排雙方人員互訪會見在貪污案中自願提供協助的證人^[23]。於 1994 年廣東省人民檢察院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授權成立了「涉港澳案件個案協查辦公室」，主要負責與香港之間進行案情互訪、會見證人和代為搜集證據等相關工作。關於澳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也於 1996 年 11 月成立了涉港澳案件工作專門機構，並且先後與香港和澳門簽署了關於互相委託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相互執行仲裁裁決及相互調取證據等協議安排。1998 年最高人民檢察院證實成立了個案協查辦公室。^[24]除此以外，近年來各地區在打擊犯罪方面也多次採取聯合行動，互相合作，形成一套解決「一國兩制」下的刑事司法協助運作的新模式。

3 指導原則與具體途徑

3.1 指導原則

筆者認為，在討論中國的刑事司法協助時必須嚴格遵守兩個原則：一是堅持主權唯一的原則，二是堅持互相尊重的原則：

(1) 堅持主權唯一的原則。這應當是各方在合作的過程的前提條件。此處所謂的「主權唯一」。之所以不使用「一國」是為了與「一國兩制」下的「一國」相區分。實際上，堅持主權唯一原則要求的是建立區域刑事司法協助的過程必須以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安全，絕對不能以犧牲國家主權為代價，否則不但不能促進各地區的合作，而且將會產生比不建立區域刑事司法協助時更為嚴重的後果。

(2) 堅持相互尊重的原則。所謂相互尊重的原則，實際上是要求各地區在簽訂區際刑事司法協時應當互相尊重各方所實行的不同法律、不同

制度和不同文化背景，不能以各自的原則和制度強加於另一方之上。如果體現在香港和澳門特區方面，這也是「一國兩制」中的「兩制」的要求。比如在逃犯移交的問題時常常涉及的死刑犯移交的問題，由於香港和澳門早已廢除了死刑制度，那麼中國內地就不能以自身仍然有死刑制度而強制香港和澳門實行死刑制度。

除此以外，還有學者^[25]主張法域平等原則、便捷高效原則等原則，然而筆者認為根據目前的嚴峻形勢來看，最基本需要堅持的應當是主權唯一原則和相互尊重原則兩個原則。

3.2 具體途徑

3.2.1 拓展個案協查制度，包括內容和形式兩方面

追溯歷史，粵港的個案協查制度最早起源於1987年，即香港的港英時代。當時廣東省人民檢察院與香港廉政公署雙方進行積極探索，建立了個案協查關係，目的是為了共同打擊貪污賄賂犯罪。貪污個案協查指的是：「通過雙方的協調，派員到對方境內對貪污個案以及與貪污相關的個案進行調查取證。」^[26]該制度的內容包括了刑事方面的調查取證、刑事訴訟文書送達、訴訟結果通報、證據交換、贓物移送和證人作證等方面。據2014年廉政公署的統計數據顯示，內地檢察院來香港調查取證16次，共詢問5名證人，廉署人員共前往內地18次，共會見36名證人。^[27]由此可見，該制度在反貪方面的合作是深度且有效的。

然而，目前內地與港澳地區的在其他方面的刑事司法協助的現狀卻不容樂觀，依據仍然是200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的《關於辦理涉港澳刑事個案協查工作程序的規定》和2001年簽署的《內地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關於建立互相通報機制的安排》，而由於這兩個檔不僅歷史久遠，而且並未涉及詳細且具體的操作規定。因此，內地與港澳間反貪污犯罪的個案協查制度值得引借鑒。

筆者認為，拓展個案協調制度應當包括兩個

方面：一方面，從內容上來講個案協查制度的範圍可以用於跨境經濟犯罪的領域，包括了打擊清洗黑錢犯罪，原因在於：雖然內地和港澳之間的法律淵源、證據規則和訴訟文化的不同，然而「查清洗錢及其上游犯罪的全部案情事實，不僅需要到上游犯罪所在法域查明上游犯罪的性質，還需要到洗錢行為地扣押提取與犯罪有關的物證、書證等」^[28]。除此以外，粵港澳三地還應當就刑罰執行方面進行司法協助的探索。洗錢犯罪的量刑包含拘役和有期徒刑，其上游犯罪也往往涉及較為嚴重的罪名，因此就目前執行難等問題需到納入協助的範圍。另一方面，從形式上來講個案協查制度應當包括多邊性和系統性兩方面，即不再是目前的中國內地、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之中兩地之間的雙邊協議，同時可以將此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制度，而不再是個案層面的協助。

3.2.2 增強區際警務方面的合作交流機制，包括數據共用和情報資源等方面

在區際警務合作方面，目前中國四地的情況是相當複雜的。從體制上看，中國內地的公安機關具有刑事司法和行政執法兩個職能；香港警務處是編制最龐大的香港政府部門及紀律部隊，根據《香港法例》第232章《警隊條例》第10條的規定其職責非常廣泛；澳門的警務機構分為司法員警和治安警察，前者隸屬於保安司，但在刑事調查工作中接受檢察院領導，而後者職能則是包括維持公共秩序及安寧和預防、偵查及打擊犯罪等為主。因此，在部門合作時往往出現權責不一致和不對應，導致刑事程序協調較為混亂的情況出現。

筆者認為，各區域應當增強區際合作機制。第一，從立法層面上，可以通過簽訂協議的方式明確具體程序，協議內容應當包含相互委託的提出、審查、安排和執行，證據的調取和移交、證人的質問和證言的取得方式、以及犯罪收益的追查、扣押、沒收和返還方面等內容的合作。針對

這一問題，無論是與洗錢犯罪有關的國際公約，還是其他區域性的反洗錢法律律檔中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確立了有關犯罪收益追查、扣押、沒收的原則、程序、條件等相應的準則和規則。^[29]在此，有學者認為可以參考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歐洲警務合作的先進經驗，具體來說就是 FALCONE 計畫及 OCTOPUS 計畫，通過深化及簡化國內警務機關與國際及區際警務機關（國際刑警、歐洲員警）等合作方式，^[30]例如借鑒歐洲委員的作法，指定及公佈關於預防及遏止跨境經濟犯罪犯的「適當行為」手冊；第二，從機構層面上，可以通過聯席會議機制的方式搭建四地部門間的區際刑事犯罪警務協助平臺，聯席會議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香港警察署、澳門保安司、臺灣警察署中的刑警、出入境管理、邊防部門組成，^[31]也可以通過建立區際警務合作委員會或者合作聯絡處的方式，也可以建立區際警務協作情報資訊中心，定期或者不定期地開展部門級例會，在保密合法和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對收集到的數據和情報進行收集、檢索、研判、共用和互通，針對期間出現的問題進行協商達成一套各方接受的程序模式，以常態化的合作暢通協助的渠道。針對跨境的洗錢犯罪，機構的合作不僅侷限於香港和澳門司法警察局商業罪案調查科與中國內地的公安機關的廣東省公安廳港澳警務聯絡科間的通力合作，還應當包括相關部門的合作。就澳門方面而言，機構應當包括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金融情報辦公室、金融管理局、經濟局和海關等部門的聯合行動，從而共同對跨境洗錢犯罪進行高效、迅速和及時的預防和打擊。建立粵澳兩地清洗黑錢風險通報合作機制、探索構建跨境可疑資金監測模型，構建聯合風險防控合作機制等交換意見，從而提升兩地跨境清洗黑錢違法犯罪活動的防範及預警監測能力。第三，從操作層面上，由於目前是互聯網和大數據的時代，因此各方能否共同確認互聯網出庭、證人作證和送達文書方式的有效性，能否通過建立電子資料庫協調有關犯罪的統計資料並及時更新，必要時針對案件的特殊情

況採取特殊的網上行動，比如簡化可疑交易報告申請的程序，相關帳戶的資金凍結（包括博彩娛樂場的帳戶）和在緊急情況下的證據及時保全等方面。通過大數據監控的數據碰撞篩選出異常的交易活動，從而增強反洗錢的能力和提高了破案率。

筆者認為，在增強區際警務方面的合作交流機制的方面，出於廣東省的區位優勢和實際需求，以及過去的實踐經驗基礎，可以以點帶面，先以粵港澳大灣區為試點，先行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開展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待時機成熟再逐步推廣。

3.2.3 促進澳門與各地間的逃犯移交，儘快簽訂相關刑事司法合作協議

目前，關於逃犯移交的問題已經成為兩岸四地一個非常迫切解決的問題。除了對犯人及其家屬人道主義方面的考慮，香港對於已決犯尤其是來自中國內地的已決犯移管具有比內地更為強烈的訴求。^[32]有統計表明，回歸後 10 年，雙方未移交過一個已決犯，並且，來自大陸的犯人佔香港所有在押犯的 28.8%（2005 年）、23%（2008 年），其中來自大陸的女犯人，佔據香港所有在押女犯的 70%（2006 年）。^[33]根據 2018 年公佈的數據^[34]顯示，內地居民在澳門違反刑法共 4,230 人涉及 3048 宗案件；非刑事違例中在本澳各賭場被發現從事兌碼 / 扒仔的內地居民共 649 人。

之所以出現如此狀況，筆者認為關鍵在於各方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有香港的學者也持有相似的觀點，認為「中國至今為止還未能和一個傳統的普通法國家簽訂引渡條約，而中澳（澳大利亞）引渡條約的最終流產更是提出了一些值得反思的問題」，同時，「香港在有關中央和特區的關係、高度自治的範圍、民主化進程的爭論耗費政治資源，也使得兩地司法協助的一些法律問題政治化。」^[35]而澳門方面同樣迫切，澳門終審法院的第 12 / 2007 號裁判及第 3 / 2008 號裁判的結論部分提到：在澳門特區，雖然來自其他國家 / 地區的逃犯可以依法予以移交，但要來自本國的特

定地區（中國內地）的逃犯在外的法律依據在於內地與澳門間尚未簽訂刑事司法協助的有關協議，也即無法可依。因此，有澳門學者則認為「中國內地和澳門兩地在『一國兩制』之下畢竟各自有獨立的刑法體系和刑法制度，各個法域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不同，甚至在本質上是根本對立，這種對立和具體法律制度和法律觀念上的差別使彼此間對同一問題的規定和認識存在分歧，單是對同一行為的罪與非罪、輕罪與重罪的判斷就已各有不同，在許多方面難以達成共識或採取一致行動，而目前這種分歧難以達到統一。」^[36]

然而，如前文提到的實踐中遇到的往往是跨境洗錢犯罪，例如 2013 年 1 月香港高等法院以洗黑錢罪判處 1 名內地男子入獄 10 年 6 個月監禁，案件中的男子在 2009 年 7 月在香港購買一家本地公司，並在香港開設了公司和個人的銀行帳戶，從 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4 月期間洗錢數額達到 131 億元^[37]；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案中前行長貪污案主犯徐超凡在挪用中國銀行資金達到 4.85 億美元後，通過澳門的賭場洗成現金，逃往美國^[38]。由此可見，犯罪份子洗錢三階段往往涉及不同的法域，另外司法機關對案犯以實際控制為條件，而在此過程中實際控制犯罪份子的法域一方應將移送至行使管轄權法域的一方，這使得打擊活動必須與其它地區進行合作。

其中涉及引渡的問題，由於涉及以上提到的雙重犯罪原則等幾個原則問題，因此在洗錢犯罪日益國際化的情況下，世界各國都在自己的國內刑事立法中進行規定，並且締結有關引渡的協議。然而，逃犯往往逃亡去沒有與犯罪地簽訂協議的國家或地區，因此遣返外逃罪犯只能通過協商和合作的方式，這就會涉及很多法理以外的因素。除了引渡以外，目前還有其他移交逃犯的方式。以英國為例，具有典型意義的區際移交逃犯模式主要包括兩種，分別是遣送制度和簽發逮捕令制度，前者適用《逃犯法（1976 年）》，主要調整英國和英聯邦成員國之間，以及英國本地與其領土之間的關係；後者適用《簽發逮捕令法（1965 年）》，

主要調整英倫三島與愛爾蘭共和國之間的逃犯移交問題。相比而言，中國內地就有學者^[39]認為第二種方式是更為符合中國區際的逃犯移交要求，原因在於該程序更為便捷，只需要被請求方對請求方簽發的逮捕令的適用條件和程序進行認可，省略了兩法域間的行政審查和司法審查程序，即可產生相同的法律效力，即逃犯可以通過兩地的司法機關的直接合作而被拘捕並移交。在本質上，此處討論的中國內地與澳門或與香港之間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關係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法域之間的關係。有澳門學者也認為，「準確地說，移交逃犯的兩地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而是『中國內地』與『中國澳門』，不應將『內地』等同於『中國』，無論是『內地』，還是『澳門』，都是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地』」。^[40]

因此，在逃犯移交的問題上，筆者認為在確立這個共識的基礎上，對待此問題的不應該完全對照國際公約的標準和方式適用於區際關係，移交逃犯原則問題的解決也應當成為可能。具體而言，採取先易後難的態度是一個方向，在已經取得的共識的基礎上，暫時將仍然有爭議的放在待列清單中，將不涉爭議的罪名整合簽訂協議，如將澳門《刑法典》和《刑事司法互助法》、香港法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503 章《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與中國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所規定的罪名進行比對，以及普遍管轄原則所涉及的罪行，在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和考慮之後，將這些無爭議部分先行列為兩地必須共同打擊的對象，譬如「以普通物品為對象的走私行為、並非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的傷人行為、普通的欺詐行為和綁架行為等」^[41]，這些行為在內地和澳門均屬犯罪，但是並不涉及公共秩序原則和死刑犯的問題。在澳門與香港、澳門與中國內地均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確立區際逃犯移交的基本原則，擬定審查程序，簽訂長期多邊移交逃犯協定，逐步達成全面協議；抑或「先由內地與澳門特區達成有關刑事司法協助安排，

再由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區，內地與香港特區相互簽署刑事司法協助安排，最終實現內地與港澳地區的全面合作」^[42] 這種循序漸進的方式。只有儘早簽訂協議，踏出第一步，建立健全的逃犯移交的刑事司法協助制度才是解決「逃犯天堂」問題的有效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澳門特區於 2019 年 3 月 1 日與內地已就開展移交被判刑人工作交換了意見並達成初步的共識，將共同努力以移交被判刑人合作為起點，以深入推進刑事司法互助方面的交流與合作。而香港方面，由於最近一宗香港居民於 2018 年涉嫌在臺灣觸犯謀殺罪的案件（陳同佳案），以及對缺乏引渡協議下處理個案移交的迫切需要，因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於 2019 年 3 月 26 日通過向立法會提交《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並於 4 月 17 日和 30 日分別就此召開第一次和第二次會議。若此草案獲得通過，香港與臺灣、香港與內地、香港與澳門，和香港與其他地區以個案方式啟動逃犯移交安排將成為可能。該建議的目的是通過「特別移交安排」^[43] 來引入臨時引渡制度，即類似英國《2003 年引渡法》第 194 條下的「特別引渡安排」，以及加拿大《1999 年引渡法》第 10 條下的「特別協定」。儘管有香港的學者提出質疑認為「英國和加拿大等國家的臨時引渡模式是否適合中國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引渡，值得商榷」^[44]，也有香港人士^[45] 認為需

要分兩階段進行改革，第一階段先改革現行法律以便通過引渡臺灣的方式迅速處理陳同佳案，第二階段才引進受爭議的「特別移交安排」^[46]，筆者認為質疑在理，且兩階段的方法也是值得考慮的。值得欣喜的是，2019 年 5 月 15 日，澳門與葡萄牙司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與葡萄牙共和國移交逃犯協定》，澳門與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之間簽訂逃犯移交協議也就指日可待了。

4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是從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背景下以澳門特區打擊跨境洗錢犯罪為視角對刑事司法協助問題所進行的探索。因為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一國兩制三地」，香港遵循英美法系，而澳門特區遵循大陸法系，與中國內地最為接近，因此以此為橋樑，從而尋求粵港澳大灣區的刑事司法協助模式最具可行性。同時，澳門特區以博彩業為支柱產業，洗錢犯罪以此為溫床，加上澳門特區特殊的地理位置，跨境洗錢犯罪氾濫。基於此，本文通過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等方面對刑事司法協助的可行性進行論證，並針對澳門特區乃至整個大灣區法治的困境和特點，提出一些符合「一國兩制」的具體構想和建議，希冀對澳門在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方面的立法和實踐有所裨益，從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刑事司法協助的進程。

參考文獻

[1] 趙國強。「一國兩制」下的中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8，（5）：17-22。

[2] 第9條：不以營利為目的，進行帶有少量財物輸贏的娛樂活動，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娛樂場所只收取正常的場所和服務費用的經營行為等，不以賭博論處。

[3] 第1條：刑法第191條、第312條規定的「明知」，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接觸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況，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種類、數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換、轉移方式以及被告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進行認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明知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有證據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

- （一）知道他人從事犯罪活動，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 （二）沒有正當理由，通過非法途徑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的；

（三）沒有正當理由，以明顯低於市場的價格收購財物的；

（四）沒有正當理由，協助轉換或者轉移財物，收取明顯高於市場的「手續費」的；

（五）沒有正當理由，協助他人將巨額現金散存於多個銀行帳戶或者在不同銀行帳戶之間頻繁劃轉的；

（六）協助近親屬或者其他關係密切的人轉換或者轉移與其職業或者財產狀況明顯不符的財物的；

（七）其他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被告人將刑法第191條規定的某一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誤認為刑法第191條規定的上游犯罪範圍內的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不影響刑法第191條規定的「明知」的認定。

[4] 第9條：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所承擔條約義務的範圍內行使刑事管轄

- 權的，適用本法。
- [5] 趙秉志，黃曉亮，論內地與澳門刑事司法互助機制的構建，澳門研究，2013，（46）：144。
- [6] 人民網。澳門舉行2018/2019年司法年度開幕典禮[EB/OL]。（2018-10）[2021-07] <http://hm.people.com>。
- [7] 趙琳琳。我國國際刑事司法中跨境取證問題探析——以證據能力的分析為重點。法律適用，2019，（5）：121。轉引自岑浩輝。在2018至2019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年度開幕典禮上的講話（2018.10.19）。
- [8] 宋敏莉。澳門與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司法合作之現狀與深化。《公正司法的制度保障》第三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司法高層論壇文集，2015年7月27-28日，澳門：澳門基金會，2016：201。
- [9] 第6條（雙重處罰）：一、引致提出刑事司法互助請求的違法行為，按照請求方及被請求方的法律，均應可科處刑事處分。二、如有關事實澳門不受處罰，但刑事司法互助請求的目的為證明是否存有阻卻事實的不法性或阻卻被迫訴人的罪過的事由，則可接納該刑事司法互助請求。
- [10] 趙國強。論「一國兩制」下的移交逃犯機制//趙國強。澳門刑法研究。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349。
- [11] 宋敏莉。澳門與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司法合作之現狀與深化。《公正司法的制度保障》第三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司法高層論壇文集，2015年7月27-28日，澳門：澳門基金會，2016：204。
- [12] 時延安。論內地與港澳之間死刑犯移交問題。朝陽法律評論。2009（2）。轉引自：趙琳琳。論中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機制之構建——以澳門特區為視角的分析[N]。澳門日報，2019-5-7。
- [13] 《澳門刑事司法互助法》第33條第1款：「被請求移交的人為澳門居民，但其國籍國提出移交請求，或移交的義務源自澳門適用的國際協約中的自行實施條款者除外」。
- [14] 森下忠。國際刑法入門。阮齊林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163。
- [15] 森下忠。國際刑法入門。阮齊林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202。
- [16] 黃亞英。論對本國人的引渡問題。法學研究，1993，（6）：70。
- [17] 趙國強。論「一國兩制」下的移交逃犯機制//趙國強。澳門刑法研究。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349。
- [18] 前引17。
- [19] 盧頌馨。中國內地對於澳門地區因博彩而衍生之債務的追償問題研究。法治社會，2017（6）：27。
- [20] 「張祥洪因受讓澳門賭博債權訴張洪債務糾紛案」，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公報》2011年第5輯（總第17輯），案例12。轉引自盧頌馨。中國內地對於澳門地區因博彩而衍生之債務的追償問題研究。法治社會，2017（6）：27。
- [21] 徐京輝。「一國兩制」框架下的中國區域刑事法律及刑事司法協助//趙秉志。中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探索。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19。
- [22] 香港廉政公署介紹——第一期香港法律信託基金會資助之全國反貪局長培訓班教材。
- [23] 陳雷。我國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實踐與發展。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3，21（5）：138。
- [24] 陳雷。從溫慶堯受賄境外追贓取證案的辦理看「一國兩制」下的區際司法協助//趙秉志中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探索。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467-468。
- [25] 焦豔鵬。論中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制度的原則。太平洋學報。2009，（5）：4-5。
- [26] 吳偉亮。粵港貪污個案協查透視——兼論反貪國際合作的途徑。人民檢察。1995，（11）：60。
- [27] 傅華伶。香港和內地的司法協助。港澳研究。2017，（3）：35。
- [28] 陳暉。內地與港澳跨境洗錢犯罪的刑事司法協助問題。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6，8（5）：35。
- [29] 趙金成。洗錢犯罪研究[D]。北京：吉林大學法學院，2005：235。
- [30] 歐蔓蓮。跨境經濟犯罪——有何對策？對刑事政策的一點看法[EB/OL]。（2003-10-24）[2021-7-13]。<http://www.pj.gov.mo/Web/u/cms/www/201608/02124741tr6x.pdf>。
- [31] 李中凡。兩岸三地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問題研究[D]。山東：山東大學法學院，2012：30。
- [32] 王麗嫻。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背景下內地與港澳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問題研究//中國國際私法學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區際法律問題研討會論文集，2019年3月30日，廣州：廣東財經大學2019：74。
- [33] See Kristine Kwok, Jail Revamp to Create 2,600 Places in Ten Yea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 3, 2005. As cited in Choy Dick Wan, Prisoner Transfer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33 Brook. J. Int'l L. 463 (2008). 轉引自：王麗嫻。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背景下內地與港澳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問題研究//中國國際私法學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區際法律問題研討會論文集，2019年3月30日，廣州：廣東財經大學2019：74。
- [34] 澳門保安司。保安司司長向傳媒發佈2018年全年罪案情況[EB/OL]。（2019-01）[2021-07-13]。https://www.gss.gov.mo/pdf/2018_C_full.pdf
- [35] 傅華伶。香港和內地的司法協助。港澳研，2017，（3）：34。
- [36] 鄭錦耀。內地與澳門簽署區際移交逃犯協議的困境及其解決。「一國兩制」研究，2017，（31）：105。
- [37] 人民日報。內地男子在香港洗黑錢131億港元獲刑10年半[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3-01-24。
- [38] 維基百科。中國銀行開平支行案[EB/OL]。（2020-12-12）[2021-07-13]。<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銀行開平支行案>。
- [39] 成良文。刑事司法協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28。
- [40] 方泉。澳門與內地移交逃犯的法律問題——兼議澳門《刑事司法互助法》的原則規定。中國刑事法雜誌，2009，（7）：122。
- [41] 鄭錦耀。內地與澳門簽署區際移交逃犯協議的困境及其解決。「一國兩制」研究，2017（31）：105。
- [42] 杜磊。內地與港澳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問題初探。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4（3）：23。
- [43]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中的特別移交安排帶來的後果是：一旦與另一個司法管轄區締結「特別移交安排」，並由行政長官發出相關安排的「證明書」，有關引渡安排，便可如有引渡條約般進行，即當作已經提交立法會完成審查一樣進行，換言之「特別移交安排」若獲得通過，毋須再通過立法會審議。
- [44] 陳弘毅。修逃犯例應考慮加額外保障[N]。《明報》，2019-05-08。參見英文原文A Commentary on the Fugitive Offenders and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 2009 ("the Bill") [EB/OL]。（2019-05）[2021-07]。<https://bit.ly/2LujkSf>。
- [45] 星島日報。田北辰：政府未能解釋港人港審不可行有法律挑戰應迎難而上[EB/OL]。（2019-05-07）[2021-07-13]。<http://std.stheadline.com/instant/articles/detail/995657-香港-逃犯條例> 田北辰：政府未能解釋港人港審不可行+有法律挑戰應迎難而上。
- [46] 亦被稱為「港人港審」。